

“就业与增长”分论坛上,与会专家纷纷认为——

中国需保持经济增长解决就业压力

本报记者 单憬岗

“世界银行每年都有世界发展报告,今年我们比较关注的问题是就业问题。”今天中午,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一语道破他所参加的“就业与增长”分论坛主题的来源。与会的其他专家纷纷认为,中国目前面临一个发展难题,一边是劳动力进入市场的压力没有减少,一边是经济增长动力正在日趋减弱,要解决这个难题,中国需要从解决就业结构、提升教育质量、发展创新能力以及扶持中小企业等方面来着手。

人口流向城市形成就业压力

中国经济正在陷入一个两难境地。首先是就业岗位缺口正在不断拉大。“十二五”时期,我国人口将达到 13.7 亿左右,劳动力资源将达到峰值。城镇平均每年需要就业的劳动力大约为 2500 万人,与“十一五”相比,不是少了,而是多了。

《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秦朔认为,虽然中国新增就业岗位在去年创造了较高纪录,达到 1200 万,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创造超过 900 万的就业岗位,中国解决就业问题应该还是有压力的。

而且,中国 30%~35%的劳动力目前仍然在农村地区务农,他们的整体收入比较低。佐立克认为,未来 5 年其中还会有很多农业人口继续流向城市,形成更大的就业压力。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却面临着潜在的持续减弱危险。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德·菲尔普斯说,欧洲、美国、日本都经历过同样的历程:从经济快速增长大量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到增长乏力就业推动力慢慢耗尽和枯竭。例如,日本在 1970 年代由于城市化进程很快,经济增长率最高达到 14%,解



4月2日,“就业与增长”主题分论坛上,嘉宾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左)与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 Stephen Groff(右)。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决了当时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移的问题。然而,当城市化进展结束后,就出现了整个国家生产性降低的问题。

“中国情况有些特殊,但也有相似点。现在中国经济已比较成熟,未来会有经济减缓的情况。”埃德蒙德·菲尔普斯说。

解决难题离不开经济增长

在当前阶段,中国要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解决上述经济发展的悖论,还是离不开经济增长。

“不管用 GDP 衡量还是不用 GDP 衡量,中国依然需要增长。”中国经济改革研

究基金会理事长樊纲说,因为就业岗位缺口等各种问题,都需要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解决。

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董事长三村明夫举例说,美国的失业率这些年一直居高不下,主要是因为就业人口出现一些增长,每年都有很多人希望就业。如此一来,美国若达不到 2.5%的经济增长率就无法降低失业率。

三村明夫和樊纲都不约而同地提到,经济增长也必须保持适度。因为一方面经济增长会带来包括环境问题、资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货膨胀和财富分配不均等方面的问题,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经

济增长不应该仅仅从就业方面考虑,而是要保持适当的比例。

中国经济增长需做诸多工作

中国经济未来依然有很大增长空间,但需要做好多个方面的工作。

东芝株式会社董事兼终身顾问、前会长西室泰三认为,对于创造就业,教育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其中高等教育尤其重要。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国必须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使得中国的下一代能够普遍享受到负担得起的教育。而目前,中国的家庭和亚洲很多国家一样,教育开支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政府必须要想办法,帮助他们减轻教育方面的开支和负担。

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史蒂芬·格罗夫认为,中国政府需要进行一些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必要决策,打造一个非常适合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健康成长的氛围,其中尤其要加大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力度。

与此同时,必须追溯美欧经济发展动力减缓背后的原因。例如,美国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在于不恰当地放宽对经济的监管,恶性竞争带来了交易成本上升。但是,另一个极端即过度监管,却会带来额外交易成本的加大。政府不断加大对经济行为的干涉力度,将会导致企业创新文化、创业精神的逐步流失。最终导致经济丧失其发展的原动力。

“对中国经济发展我基本持比较乐观的态度。”埃德蒙德·菲尔普斯说,中国有可能实现自主创新能力的大爆发,从而使中国创造出一种内在的经济发展动力,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使得中国经济能够保持长期的增长。

(本报博鳌 4 月 2 日电)

“亚洲城市的未来”分论坛嘉宾表示——

城市发展必须解决可持续问题

本报记者 单憬岗

随着近现代文明的飞速发展,城市出现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包括人口爆炸,带来城市规模的爆发式增长,给环境、生态、资源等各个方面带来绝大压力。

今天下午召开的“亚洲城市的未来”分论坛上传出信息,只有城市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才会有国家乃至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发展离不开公共交通

世界十大超级城市中 7 个位于亚洲。爱立信公司董事长雷夫·约翰森认为,城市的交通不能完全依赖于私人汽车,要增强个人的移动性,必须要有良好的公共交通。良好的公共交通要安全而且可负担,需要把各个不同的居住区或者不同的群体都用公共交通联系起来,通过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将公交车、地铁、铁路很好地衔接起来。

“要做到看一眼手机,就能知道坐哪一路公交车。”SOHO 中国首席执行官张欣形象地描述了什么是未来的公共交通。

手机交通系统能够如何利用公共交通到达目的地,提出建议出行的最佳路线。所有的交通系统都会及时告知,在这条线路上实际和预测的人数和车辆数,从而让手机客户对此进行精确应对。神州数码董事局主席郭为说,这种方式实际上已经在很多城市实现了,例如纽约两年前就实现了。

智慧城市可解决发展问题

所谓智慧城市,简单的说,就是用虚拟的技术、信息的技术去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难题。

“智慧城市,根本目的就是使每个人的生活更幸福。”郭为说,智慧城市不仅包括智能交通,而是包括解决 3 个大方面的问题:民生工程、城市现代化管理、城市的经济可持续发展。

例如医疗是民生大问题。在智慧城市中,每个人从挂号到初步或者紧急的诊疗,

都可以采取互联网远程的方式进行。而每个人的医疗档案,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方式进行建档,从生到死都有很好的记录,让各家医院共享,从而让每个医生轻松获得病人的既往病史,病人也可以轻松实现转移就医。

目前,城市发展还必须考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改变传统粗放增长方式。而智慧城市项目的建设本身,由于大量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产生大量的现代服务业,推动就业和城市产业的升级。

目前,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新技术不断涌现,为智慧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技术基础和可能途径。

城市发展必须保留灵魂

一个城市无论如何发展,都必须有自己的特色与灵魂,把城市发展中有文化的东西一直传承下去。

台北市副市长丁庭宇说,该市在发展过程中,就非常重视保留自己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建筑,甚至连夜市文化也作为台北的重要文化得到了保留。

“我在大陆旅行,常常发现城市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往往容易丢掉了各种传统。”丁庭宇认为,这是一种令人非常痛心的事。他认为,城市的管理者都应倾听民意,把最传统、有价值和文化的东西,包括建筑、老店品牌等,都尽可能地保留下来。

芝加哥市前市长戴利也表示,在芝加哥建设千年公园的时候,就决定要保护当时 80 栋建筑。往城市发展方向看,既可以看到一些老建筑,同时也可以看到一些摩天大楼,这样就可以了解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脉络,这样城市才有自己的灵魂。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精神,在跟随全球化发展步伐的同时,要带着这些历史的印记。否则这个城市就是冷冰冰的钢铁水泥森林。”戴利如是说。

(本报博鳌 4 月 2 日电)

年会观察



4月2日,“亚洲中产阶级的兴起与消费变革”分论坛上,嘉宾 JDK 副主席桑贾伊·瑞迪在发言。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将会是美国中产阶级人数的四倍。这是今天下午博鳌亚洲论坛《亚洲中产阶级的兴起与消费变革》分论坛传出的信息。

亚行报告称,亚洲中产阶级人数迅速膨胀,有望超越欧美,成为全球第一消费群体。这将有利于亚洲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内

亚洲中产人数有望超过欧美

本报记者 赵红 通讯员 岳媛

需型转变,增强对外围环境波动的抗压性。

亚洲中产阶层人数迅速膨胀

近年经济学界有一种“雁行模式”提法,这个提法不仅在亚洲的产业梯度中转移,也在亚洲中产阶级崛起中呈现。亚洲中产阶级的崛起遵循经济发展水平的传导机制,从日本到“四小龙”、“五小虎”,再到中国和印度。

泰国《民族报》去年曾刊发文章提到,亚洲经济展现潜力,主要得益于中产阶层的崛起。支持这一提法的论据是,亚洲目前中产阶层的数量为 5.25 亿,约占全球中产阶层总数的 28%。未来 10 年,这一数字有望增长到令人难以置信的 17.4 亿人,超过全球中产阶层总数的一半。文章说,中产阶层的标准是新加坡星展银行提出的,即指每人每天平均消费超过 10 美元的消费。

今天讨论嘉宾印度 JDK 副主席桑贾伊·瑞迪也提到,印度 2020 年大约有 6 亿人会成为中产阶级,印度和中国最大的不同是,此前的发展更多依赖消费,这样受全球的影响就会小一些。印度人口平均年龄低,50%人口是在 25 岁之下,75%的人口是在

40 岁以下,这些年轻人对未来有望望值,他们推动着印度的增长、消费这个群体。

中产阶层消费持续增长

新加坡星展银行《亚洲 2020》的报告说,全球中产阶级市场需求将从目前的 21 万亿美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35 万亿美元,而其中 70%的增长将来自亚洲。亚洲中产阶级消费的持续增长,来自于对耐用消费品、教育和医疗、汽车和房地产以及能源和大宗商品的需求。报告认为,中产阶级消费的增长首先来自冰箱、电视、手机等耐用消费品。

崛起的亚洲中产阶级对于教育和医疗服务的需求也将迅速增长。一般而言,中产阶层有更高的意愿在教育和服务上花钱。以泰国为例,泰国中产阶级花在医疗和教育上的钱是更低收入阶层的两倍。汽车和房地产消费也将呈现繁荣景象,从而带动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预计在 2020 年,每 10 个中国人中将拥有 2 个人拥有汽车,届时中国的汽车年销售量将超过 3000 万辆。2010 年中国汽车销售量高达 1800 万辆,早在两年前就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汽车消费国。而亚洲国家的城市化

进程,将带动人们尤其是中产阶级对于房地产的需求。此外,亚洲中产阶层的崛起将带动对能源和大宗商品的需求。

中产阶层消费潜力被看好

尼尔森全球副主席 Rick Kash 今天在分论坛上表示,他看好中国中产阶级的购买力。他说,历史数据显示,1975 年,日本消费指数过高。当时,亚洲中产阶级人数占全球的 3%,中产阶级的消费金额占全球的 2%。而在 2010 年,这两个数字分别增长到了 24%和 16%。高速增长的原因是中产阶级的增加和购买力的增加之间有因果关系。中国的私人银行业务发展迅速,并希望模仿美国,用这一项业务创造投资、就业机会,并提高购买力。所以,中产阶级的增加和购买力的增加之间有因果关系。他认为中国未来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证券柜台买卖中心董事长陈树、中国国务院研究室副司长范必、尼尔森全球副主席 Rick Kash、JDK 副主席桑贾伊·瑞迪、天津副市长任学锋参加了《亚洲中产阶级的兴起与消费变革》分论坛讨论。

(本报博鳌 4 月 2 日电)

汽车领袖论坛

关注新能源汽车市场前景

本报博鳌 4 月 2 日电 (记者梁振君)“环球汽车领袖论坛”今天下午在博鳌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论坛主要围绕后危机时代的汽车行业新趋势、绿色汽车的未来与技术创新、新商业模式和品牌战略、新兴市场的前景、汽车城市发展等话题展开交流。

绿色出行是人类步入汽车时代后的根本追求。大众汽车集团(中国)执行副总裁张绥新说,未来 10 年到 20 年内,全球汽车市场,特别是私人车市场的新能源发展非常有限,节能减排贡献有限,需要挖掘传统内燃机车的节能潜力。他批评一些企业和地区关门来自己造新能源汽车,认为企业和地区需要打破封闭,对外开放,积极寻找全球合作。

广汽集团董事长张房有透露,广汽将在 2015 年实现 20 万辆新能源汽车的生产目标。他强调,广汽新能源汽车产业化要考虑四个因素:即产业配套、政府的支持力度、人们的使用习惯和环保意识。

标致雪铁龙第一副总裁 Gregoire Olivier 指出,中国市场不仅是全球最大的汽车销售市场,也成为了全球汽车最大的研发市场。

据悉,2011 年我国汽车销量为 1850.51 万辆,同比增长 24.5%。截至 2011 年年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为 2.25 亿辆,其中汽车 1.06 亿辆,跃居世界第二,而全国机动车驾驶人现已达 2.36 亿人。业内人士认为,包装以及市场的过程当中,现在中国需要更多地关注人才竞争。

张绥新表示,中国汽车市场前几年经历了爆发式增长,但特夫夫没有做好迎接汽车社会的准备,部分城市采取了限购等措施。他建议政府应当出台相关政策,行业和社会合作,才能解决问题。

针对业内对汽车产业产能过剩的担忧,张房有回应称,汽车产业发展有周期性,和世界经济周期相互联系。另外,结构性问题是汽车有效产能不足,低效产能过剩。

低成本时代可能会逐渐失去 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要趁早

本报博鳌 4 月 2 日电 (记者梁振君)被誉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正面临成本上涨等越来越多的挑战和压力。今天在博鳌参加《新兴经济体:结构调整与认识误区》论坛的嘉宾认为,中国制造的低成本时代可能会逐渐失去,企业必须看到这一点,及早把企业竞争力的基础从低成本转到技术或者品牌上,重塑自己的竞争力。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认为,中国的企业,尤其是中国的制造业企业,现在正面临着“一个非常尖锐的挑战”。他说,以往大多数的制造业企业的竞争基础是放在低成本之上的,中国的企业制造成本比较低,但制造低成本时代可能会逐渐失去。

就主持人提出的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应该注意哪方面的问题,德勤全球首席执行官 Brian Dersken 认为,中国现在正处

于转折点的关口,人工增加等因素的影响使得中国继续保持现在的制造业的领导地位是比较困难的。因此,中国应该不断地升级,更多地参与到设计、包装以及市场的过程当中,现在中国需要更多地关注人才竞争。

Brian Dersken 还建议,随着中国在制造业当中进行升级,中国还需建立全球的联系,包括全球的供应链、配送链等,同时应该更多关注研发和创新行业。

对于中国制造业如何应对未来的挑战,塔塔咨询服务公司副董事长 Ramadorai Subramanian 建议,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投资于研发,投资创新,要实现大量的自动化,要持续提高员工的技能水平,让他们更加专业和职业化,这也将改变他们自己的职业发展规模。

中印人士一致认为

两国需加强文化往来消除成见

本报记者 袁锋

“那种以相互怀疑的眼光打量彼此是大国之间经常出现的情况,因为他们在一些问题上有着不同的立场。”在今天的“印度经济展望”分会上,印度计划委员会副主席 Ahluwalia 表示,中印两国确实应该进行更加直接的沟通交流,加强文化往来,消除双方的某种成见。这些看法得到了在场人士的共鸣。

由于文化交流与经济交流密不可分,会场的话题因一个提问而逐渐转向两国文化领域交流。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说,他有个个人观点:相比其他方面的合作,中印之间的媒体交流好像比 1950 年代、60 年代略微逊色。因为那个时候印度能看到很多印度的电影,也看过很多印度的舞蹈。而现在,印度国内对中国的看法基本上都是从西方传过来的。“我担心世界上两个大国之间,还是互不了解。双方互相在揣摩着对方,而不是

坦诚相见。”魏建国因此建议从官方到企业界等,应该加大双方的交流。比如在教育领域,印度对学生创造力的培养比中国做得好。双方在媒体、文化等领域都有很多交流的余地。他建议中印两国要保持媒体友好,如果媒体友好对关系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经济方面一定会做得更好。

这一席话马上得到了 Ahluwalia 的积极响应,他表示完全同意,双方应该有更直接的交流。中国现在看到印度电影的机会好像更少了,这种情况应该得到立刻扭转。“我也期望有很多中国游客能够到印度来。现在,中印两国贸易投资大幅度增加,很多印度企业在中国投资,也有很多中国企业到印度投资。我们还认为两国智库之间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让经济学家们进行交流就是个好主意。”

(本报博鳌 4 月 2 日电)

“亚洲人口形势与老龄化对策”分论坛上,众嘉宾阐述对人口老龄化的独到见解

“银发时代”同样可以发展好“银发经济”

本报记者 胡续发

如今,海南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候鸟”老人也越来越多,会不会给海南的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海南是否可以因地制宜做好老年人的文章?

在今天上午的“亚洲人口形势与老龄化对策”分论坛上,财经传媒总编辑胡舒立,以及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肯特·凯尔德、加拿大养老金投资署高级副总裁马克、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约翰·奎尔奇、印度南新制药创始人马尔文迪、三井物产株式会社社长枪田松莹等嘉宾,阐述了自己对老龄化独到的见解,给海南带来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不要迷恋“人口红利”

人口越多,经济增长越快?“日本在亚洲是最早老龄化的,反过来说,日本在亚洲已经结束了的国家。”枪田松莹说,1950 年左右日本开始出现“人口红利”。随着老龄化越来越严重,经济也逐渐衰退。

枪田松莹认为,目前中国、印度等国家,有着非常理想的人口结构和大量年轻的劳动力,未来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获得持久快速增长的动力,来自于这些年轻人。

来自印度的马尔文迪表示认可枪田松莹的说法,他说,印度在人口方面确实有优势。在印度,十几岁到五十岁的人占总人口的 60%,而 60 岁以上的人只占 6%,16 岁以下的占 30%。未来 10~15 年,印度 20~35 岁的人群将占总人口的 50%以上。“所以,印度将会有相当多可以就业的人口,可以创造生产力的入口。”马尔文迪很乐观。对“人口红利论”,陈志武并不认同。



4月2日,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2 年年会,“亚洲人口形势与老龄化对策”分论坛。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不要把经济实力和人口规模划等号。”他说,不要以为中国经济保持世界上第二大地位,而一味追求更多的人口。今后中国再不要重复依靠勤劳带来的经济增长,而要依靠技术革命带来经济增长。“我们不要迷恋人口红利,这不是好事,说明人的价值太便宜,人的权利得不到尊重。”

抓住商机发展“银发经济”

当“银发时代”不可避免地到来,如何发展“银发经济”?

肯特·凯尔德说,日本已到了“银发经

济”时代,使得制药行业、新型医疗服务、旅游业、养老院等等产业不可或缺,面临着广阔的市场空间。比较来看,中国也有很多的老年人,而且逐步进入老龄社会,将来养老院的发展在中国会非常兴旺,还有旅游产业的发展也会比较快。

“海南也是因为养老的人越来越多,而得到了兴旺。”肯特·凯尔德认为。

马克认为,并不是所有老年人只会存钱,如果你想让他们的消费更多,那么就让他们去工作,尽可能给他们工作时间。

据马克介绍,麦当劳正在邀请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做店铺经理,因为他们有足

够的经验。而日本的一些商家正在让部分鳏夫和寡妇管理店铺,发挥他们任劳任怨的优点。

养老金可投资资本市场

“养老金入市总的方向正确。”陈志武说,其他国家有这方面的传统。他认为,股市如果跟经济发展联系紧密,这样能够保证他们退休后领到的养老金,购买力不会相对于经济的增长而下降。

马克认为,加拿大养老金基金在国际市场进行投资,进一步满足了老年人群养老的需求,也符合预期寿命的需求,具有长期而可持续发展意义。

关于养老基金的投资方式,陈志武和马克观点相同,他认为,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还有些局限,绝大多数人只投资中国的股市或者政府债权市场,不利于个人资本的增值。应该让中国的老百姓、家庭和企业有更多的途径投资境外资本市场。他说:“在全球范围分散投资,只有这样,投资安排才更理性。”

肯特·凯尔德则介绍了新加坡的经验。新加坡的中央养老金基金进行改革后,储蓄机制更加灵活,在全球范围的投资使得投资风险在全球层面得到了多元化,也许可以以给中国提供有益的借鉴。

(本报博鳌 4 月 2 日电)